台湾地缘战略地位的形成与变迁

李振广

台湾是一个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岛屿。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是从无到有，并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经济政治交往的逐渐密切而日益增加的。自近代以来，在中国政府与人民反对外国列强的斗争中，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被纳入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轨道，成为遏制中国战略防线中的关键一环，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逐步强大，以及中国对全球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的重要性的大幅度提高，台湾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也在发生变化。

一、台湾地缘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早期演变

决定地缘政治地位重要性的关键因素是地理位置和国际社会之间交往的程度。台湾地缘战略地位的基础是它的地理位置，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和相互经济政治交往得以确立、并随着交往的密切而提高。

1. 从化外之地到海上交通要道

在早期中国历史上，台湾一直处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由于古代中国及西太平洋地区各地社会经济都不发达，大陆与当时台湾的交往也十分有限。东汉及以前的史书中没有关于台湾的任何记载。公元230年，东吴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据推测当时的夷洲就是现在的台湾。[1]"夷"乃夷狄之意。仅从字面上理解也可知道，当时的夷州是一个遥远的化外之地。公元610年隋炀帝派兵远征流求。根据《隋书》对流求的地理位置、居民等情况的记载，这次所到达的流求被认为"肯定是后代的台湾"。公元230年和610年，大陆王朝两次出兵台湾均无建树，"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福建南部尚未开发，"[2]至于开发台湾更是遥远之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陆与周边地区的交往微乎其微，这样一个远离大陆、尚未开化的海岛当然也就谈不上任何地理上的重要性了。

自唐代开始，中国与外国的交往及贸易日益频繁，靠近台湾的泉州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对外港口。尤其是自南宋以来，随着江南各地手工业和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与国际交往的增加，台湾海峡便日益成为一条繁忙而又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随着沿海地区的开发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大陆渔民、商船对澎湖、台湾的认识和交往逐渐增加，澎湖地区逐渐得到开发。公元1290年，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正式对这一地区实施行政管辖。但台湾岛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仍不具备任何重要性。

2. 明清之际，台湾地缘战略地位的崛升

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治及经济贸易交往的日益增加，是台湾地缘政治地位崛起和上升的基础。台湾地缘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则是中央政府在东南沿海地区与倭寇、海盗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开始体现的，并且在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变得愈来愈重要。

到明朝中叶，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在暴利的诱惑之下，倭寇、海盗横行于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成为东南沿海的大患。在明政府与倭寇、海盗的斗争过程中，澎湖、台湾不时成为倭寇、海盗的休养、藏身之地和进犯沿海各地的巢穴。澎湖、台湾的军事战略重要性开始显现出

来。为打击倭寇和海盗，明政府于1563年重新设立澎湖巡检司。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福建巡抚许孚远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指出，“澎湖遥峙海中，为诸夷必经之地，若于此处筑城置营，且耕且守，据海洋之要害，断诸夷之往来，尤为胜算。”[3]正是由于澎湖、台湾作为海上交通要道和海盗、倭寇的巢穴，“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台湾由此而为各国所注视，其地理上的重要性，亦因此渐为一般人所认识。”[4]

除倭寇、海盗外，澎湖和台湾也正在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觊觎之地。在西方殖民主义的远洋冒险和扩张中，葡萄牙人于1548年在日本建立商站，开辟了从欧洲到日本航线。随后，荷兰、西班牙也相继加入这场贸易与殖民主义扩张之中，试图在中国沿海地区寻找殖民据点，以方便贸易和殖民掠夺。台湾以其靠近这条航线和大陆“遂显出其在位置上的重要性，而为各国所重视，并竞相争逐，而欲取之为基地。”[5]台湾从此成为日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争夺的焦点。在这场争夺中，台湾的地缘地位及对中国东南沿海安全的重要性骤然上升。

为保卫沿海安全，1604年明政府在澎湖增置游兵，派兵屯驻台湾鸡笼、淡水。1609年和1616年两次击退进犯澎湖、台湾的日本侵略者。荷兰殖民远征军于1604年、1622年两次入侵澎湖，先后被明军打败。1624年荷兰人从澎湖败退到台湾，并在台湾筑城盘踞，开始对台湾的殖民统治。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台湾北部。1642年西班牙被荷兰打败，台湾北部也落入荷兰人之手。由于正值中国的明末农民战争时期，明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台湾问题，遂使荷兰人暂时得逞。

清王朝建立后，为建立抗清复明的基地，郑成功率军赶走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消除了外患，但是对于清政府而言郑氏政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心腹之患，是对清王朝的威胁。直到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这一威胁才真正消失。

统一台湾后，清康熙皇帝曾认为，“台湾属海外地方，……即台湾未顺，亦不足为治道之缺。……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6]很显然当时的康熙帝出于中央帝国的自信，仍以传统的眼光看待台湾，仅视之为边远化外之地，无足轻重，未能从更长远的战略角度来认知台湾的重要地位。当然，清初国力强盛，西方殖民者的力量尚不足于形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实质威胁，这也是台湾地位被轻看的原因。对此，曾指挥清军收复台湾的施琅上疏康熙，力陈台湾与东南沿海安全的利害关系。施琅指出“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他指出台湾过去一直是海寇和红毛（荷兰）人进犯沿海的巢穴，如果荷兰人“再得此地，必倡合党伙，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因此，施琅指出，“台湾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即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转运输，亦断断乎其不可弃。”[7]施琅的上疏阐明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改变了清政府一些大臣和康熙对台湾的看法，清政府因此决定在台湾正式设立地方政府。台湾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安全屏障的战略地位得以确立。

从清政府收复台湾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间，一方面鉴于清王朝的强大，国内繁荣稳定，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掠夺的中心还未转移到远东地区来，海外列强未敢染指台湾。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民得以对台湾进行充分的开发，使台湾作为中国安全屏障的地位得到巩固。但在祖国强大及周边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并未得到体现。

3.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与作用

进入十九世纪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路，国力逐渐衰微。而这一时期，在殖民竞争与掠夺中日益壮大起来的西方国家开始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侵略中国的浪潮一波波涌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间，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数省之安全门户的台湾相继遭到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列强的军事入侵。外国列强欲强占台湾作为进一步入侵大陆基地的企图更显现出台湾对于大陆安全的战略重要性。中国人民数百年的经营开发使台湾作为大陆安全屏障的基础得到巩固，因此外国列强的侵台行动在台湾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下均告失败。在这一时期打击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台湾发挥了支持大陆抗击外敌入侵、护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安全的战略屏障作用。

明治维新后，日本也开始加入到对外扩张、强占殖民地的行列中来，而朝鲜、琉球、中国的台湾则是日本殖民扩张的第一批对象和入侵中国大陆的外围基地。1895年日本借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之机，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在日本对台湾实施殖民统

治的五十年期间，中国不仅失去了台湾这个东南沿海的安全屏障，而且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沿海各地的战略跳板。台湾是日军在1938年末和1939年1月入侵中国广东和海南岛的主要军队集结地。战争期间，台湾还是日军控制台湾海峡，封锁中国南北海上交通的战略据点，使中国抗日军民只能通过缅甸等国作为获取美英等同盟国战略物资的通道。

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和对东南亚国家的军事进攻中，台湾优越的战略位置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充分利用，对于日军取得战争初期的胜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进攻东南亚的南进政策确定后，日本驻台湾的殖民政府实施的三项基本的政策之一就是把台湾变成“‘南进’华南和东南亚的一个跳板。”[8]在发起对东南亚军事进攻之前日军制定的《大本营作战计划》中规定“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作为整个南方作战的主要兵站基地，以台湾作为中继补给基地。”[9]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直到1942年5月菲律宾投降前，台湾一直是日本海空军进攻菲律宾的主要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以台湾为基地承担起保卫日本本土及其与东南亚各地交通联系的任务，展现出台湾作为日本西南海上屏障在战略上对日本本土安全及其与南洋各国间交通的重要性。

战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随着中国内战和亚太地区国际政治斗争的发展，台湾被纳入了美国亚太战略的轨道，成为美国亚太霸权构架的支柱之一和制衡中国大陆的一个战略工具。

二、战后台湾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

战后五十年来，台湾的地缘政治地位仍然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一时期台湾地缘政治地位的变迁与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大格局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亚太地区大国实力的变化与相互关系的演化组合则是决定台湾地缘政治地位的主要因素。由于自战后以来台湾一直是美国控制与主导下的亚太军事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台湾的地缘政治地位变迁与美国的亚太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并主要体现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

1、1950—1969年台湾在美国全球冷战遏制战略中的地位

20世纪前四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是有限的。但通过太平洋战争，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打败并占领了日本。在太平洋上，除千岛群岛外几乎所有重要的岛屿都处在美国的军事控制之下。在这一地区，南朝鲜、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美国的盟友。太平洋几乎成了美国的天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初步确立。这样，维护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就成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对亚太政策的关键。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苏联和美国成为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力量，并分别以美苏两国为首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对立的阵营。然而不久，两大阵营之间便在欧洲爆发了冷战，随后波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美国对苏联冷战政策的特点是“遏制”，即采用政治、军事等手段阻止苏联阵营势力范围的扩大。在亚太地区则是大力支持南朝鲜的李承晚政权和内战中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然而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美国的势力和国民党政权一道被逐出大陆，退往台湾。

早在1948年11月，即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征兆日益显现时，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已经开始关注台湾的未来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如果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为不友好方所控制，一旦发生战争，敌人的力量能够控制从日本到马来西亚的海上路线，他们由于能将其控制的范围扩大到琉球群岛和菲律宾而大大提高其能力，对我们国家安全造成的战略后果将是很严重的。”据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不管目前中国的局势及基本趋势如何，如果能采取适当的外交上和经济上的步骤来避免福摩萨被共产党所控制，以确保福摩萨政府对美国友好，这对于我们国家安全利益将是最有价值的。”[10]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与苏联正式建立政治军事同盟关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成员。这一形势直接威胁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稳定。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在亚太地区的进一步扩大，美国从全球冷战的战略角度出发，在加紧对日本进行军事控制和经济扶植的同时，以日本为中心，以西太平洋边缘的岛屿链为基础，建立了一条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前沿。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在朝鲜的军事对抗使台湾被正式纳入了美国的全球冷战的轨道。这一时期台湾的地缘政治地位也正是由这一点决定的。1950

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还声明“共产党军队占领福摩萨将会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太平洋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11]很显然，台湾作为美国北起日本本土和冲绳群岛南至菲律宾群岛的一系列战略基地中的重要一环，美国基于在远东太平洋上战略及意识形态利益的考虑，绝不会把它交给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对手——中国政府。这样一来，中国的统一进程就因美国的插手而中断于台湾海峡。不仅如此，美国力图以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颠覆等手段搞垮中国。台湾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与大陆敌对的政治制度使之成为美国推行对华冷战遏制政策的一个合适的小伙伴。

1954年12月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政府在华盛顿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通过这一条约正式把台湾纳入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组织的反共军事同盟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推行冷战遏制政策的工具。在五、六十年代，台湾也确实发挥了这种作用。首先，台湾是美国为确立其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而构筑的由一系列军事战略基地组成的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防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其次，为配合美国在东亚对中国的冷战政策，台湾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军事上对大陆进行威胁、骚扰和牵制；经济上对大陆进行封锁和禁运；在政治上对大陆进行颠覆、破坏大陆政治的稳定，是美国推行对华冷战的主要工具与前沿基地。第三，台湾还是美国在远东重要的军事后勤基地。60年代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进一步提高了台湾的战略价值。作为美军在东南亚进行军事行动的集结和后勤基地，在越战高峰时期有10000多名美国军人和顾问驻扎在台湾。[12]

总之，在五、六十年代冷战高峰时期，台湾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战略上都是美国维护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霸权体系的主要支柱之一，在美国的冷战遏制政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1970—1989年台湾地缘政治地位的相对下降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冷战对峙及各国实力、政策的变化，到60年代末，在亚太地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首先，美国因陷于越战及实力相对下降，继续推行全面冷战遏制政策已是力不从心；其次，中苏两国因政治和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与矛盾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中国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坚决反对苏联霸权扩张的坚定政治力量。正是由于这两个关键性因素的转变，70年代初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那就是中美两国开始因战略和安全的需要而走到一起。这样，自50年代以来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中苏与美国两大阵营的冷战对抗，逐渐演变成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中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从美国的对手与敌人转变成美国在战略安全上对付苏联的一个战略伙伴。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缘政治地位的下降。鉴于同中国发展战略安全关系的需要，台湾由美国当年冷战对峙中遏制中国的冷战工具逐渐转变成制衡中国、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一个战略筹码。这使台湾的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

整个70年代，中美关系的解冻与中美建交都是基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转化与提升和台湾地缘政治地位的下降这一战略考虑来决定的。当然，美国在台湾有着重大的既得利益，中美两国战略上的相互需要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还不足以使美国放弃在台湾的霸权利益。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各种联系、对于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战略安全利益都是重要的。因此，中美建交并未导致美国彻底断绝与台湾的关系，相反，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实质关系。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对外政策大调整，加上美国政府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和维护其在亚太地区霸权利益的需要，台湾问题实际上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一张牌。

3、冷战结束初期台湾在美国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曾经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不复存在。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冷战结束后，为建立美国领导的全球政治新秩序，美国确立了新的两洋战略，那就是在大西洋以北约为支柱，推进北约东扩；在亚太地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形成在欧亚大陆东西两岸的战略呼应并向欧亚大陆腹地推进的战略态势，以便控制欧亚大陆，并最终控制整个世界，确立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目标。在这种战略态势下，冷战后时代作为欧亚大陆乃至全球最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的中国，便在实际上成为美国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全球战略的一个重大目标。

在上述战略大背景之下，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缘政治地位再次跃升。台湾经济的成功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被美国视为亚太地区的“民主橱窗”。台湾再一次成为美国推动中国和平演变的前沿基地、台湾也一直以此为己任。加强与台湾的政治、军事安全关系是美国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实施欧亚地缘政治大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在发展与中国关系时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筹码。这样，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缘政治地位再次凸显出来。利用台湾问题，发挥美台关系对中国的制衡和牵制作用、对于美国实施其全球战略有着特殊的意义。

三、台湾地缘战略地位的未来走向

从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来看，自1950年以来亚太地区就被沿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台湾海峡划分为两部分。这条线以西是由中国、朝鲜等国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东边则是以韩国、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等为战略支柱建立起来的美国主导下的亚太霸权体系。时至今日，亚太地区这一战略安全结构仍未被打破。虽然美台已经没有正式的政治关系，但美国坚持“继续同台湾保持牢固的非官方的实质性关系”[13]。美国不仅在政治上支持台湾，在军事上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而且继续把台湾纳入到美日同盟的战略保护圈之内，这说明台湾仍然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和美国亚太霸权体系的重要支柱。

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意义最为深远、最为紧迫的挑战。”[14]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继续充当亚太地区的霸主就必须维持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完整性。台海两岸的统一在地缘政治上也就是美国势力范围的缩小和主导地位被削弱，同时也是中国战略安全地位的强化，其结果将使现有的亚太安全结构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是美国所不愿接受的。这也正是由于地缘战略的原因使台湾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所在。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的中心已经由冷战时期的斗争与对抗转向国家间的合作、协调、交流与沟通，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已成为国际发展的大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日益好转，国力明显增强。美国一方面希望与中国加强经贸和政治文化联系，以便使美国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又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这时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缘战略地位是十分尴尬的。一方面，美国要继续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维持海峡两岸的分裂现状。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愿意因台湾问题而陷于同中国的对抗。但是，鉴于中国大陆的崛起，台湾与大陆对于美国战略利益的重要性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从历史上看，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的演变有两大特点：(1)在战争和国家间激烈对抗的年代，台湾的战略地位因其处于亚太国际政治斗争的核心地区而提高，反之，其地缘战略地位也会因这一地区政治对抗的减弱而降低；(2)中国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时期，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就相对降低，被外国利用来对付中国的机会和可能性也小，而当中国积弱积贫时，外国势力也就往往企图利用台湾作为入侵、掠夺和牵制中国的基地和工具，此时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中国的繁荣强大及亚太地区国家间由合作、沟通代替对抗的地区和平环境将会使台湾的地缘政治地位重要性明显下降。可以预见，随着大陆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及中美、台海两岸经济联系与相互依存的加强，在美国的对华战略中台湾可资利用的程度和有效性将越来越低。这一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

注释：

[1]缪钺主编《三国志选注·吴主传》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32、833页。

[2]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7页。

[3]薛国中、韦洪编《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542页。

[4]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5年版，第26页。

[5]《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第26页。

[6]张本正：《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1页。

[7]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8、99页。

（下转第136页）

自民党内矛盾的过程中积劳成疾而逝。大平一生在"充满妥协、协调和坚持原则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取得艰难的平衡。"[29]的确，运用"椭圆哲学"是带着脚镣的舞蹈，而大平正芳一生都在充当悲壮的舞者。

"椭圆哲学"作为大平正芳最有特色的政治遗产，一向受到日本政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曾呼吁日本政府官员重新学习研究椭圆哲学。中国是"椭圆哲学"的受益者：大平汲取中国文化的养料创造出了"椭圆哲学"，又在"椭圆哲学"的指导下为中日友好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大平逝世后的历届日本政府对此则少有建树，甚至出台损害两国关系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政界也的确有重新学习"椭圆哲学"的必要了。

注释：

[1] 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许晓光著) 第 43 页。

[2] 见《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李德安等编译) 第 7 页，转引自《老子》(德间书店 1979 年出版) 第 36－37 页。

[3] 见《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11 页。

[4] [5] [6] [7] 见《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21－25 页。

[8] [9] 参见公文俊平：《大平正芳的时代观》(《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52 页)。

[10] 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第 256－276 页。

[11] 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第 43 页。

[12] 参见宇治敏彦：《大平正芳的派阀观》(《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370－371 页)。

[13] [14] [15] [16] 见《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53－56 页。

[17] [18] [19] [20] 见《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63－70 页。

[21] 参见《战后国际关系史》(方连庆等编) 第 668－681 页。

[22] 参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第 181－200 页。

[23] 参见阿部穆：《为台湾问题煞费苦心的大平外交》(《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489－508 页)。

[24] 见《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118 页。

[25] 参见《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110－134 页。

[26] [27] 见《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108 页。

[28] 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第 205—210 页。

[29] 见《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第 292 页。

(上接第 124 页)

[8] Harry J. Lamley, "Taiwan Under Janpanes Rule, 1895 ～ 1945: The Vicissitudes of E. Sharpe, 1999, p235.

[9]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325 页。

[10] 梅孜：《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9 页。

[11]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 72 页。

[12] Micheal Y. M. Kau,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 for Taiwan", *The Strategic Triangle*, edited by Ilpyong J. Kim, New York 1987, p. 184.

[13] 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5 页。

[14] 理查德·N·哈斯：《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8 页。

(上接第 129 页)

[9] 冯建三 (1996)：《美国与直播卫星——国际太空广电政治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0] 张锦华 (1990)："传播效果理论研究"，载《新闻学研究》第 42 卷，第 103～121 页。

[11] 汪琪、钟蔚文 (1988)：《第二代媒介：传播革命之后》，台北：台湾东华书局。

[12] 李秀珠 (1995)："新科技与媒体组织的影响：从卫星科技谈起"，《媒介与科技：透视传播文化与社会》，第四届电影电视录像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13] 丘宏达等 (1993)：《现代国际法》。台北：三民书局。

[14] 杜力平 (1991)：《大众传播学理论》，台北：五南书局。